

反平等主义、“差异的权利”与 “欧洲帝国”：论法国“新右派” 领袖阿兰·德·伯努瓦的 欧洲主义思想^{*}

黄子翊^{**}

【内容提要】 不满于左翼的话语霸权和右翼在欧洲问题上的失声，以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为首的法国“新右派”（Nouvelle Droite）知识分子提出了一种既不同于欧盟模式和普遍主义的欧洲主义，又超越了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独特右翼欧洲主义思想。以反平等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批判、“差异的权利”（right to difference）和重建“欧洲帝国”的理想构成了伯努瓦欧洲主义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中以反平等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批判构成了其思想的背景和基础；“差异的权利”构成了其理论内核，是其针对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方案；而“欧洲帝国”理想是对其“差异的权利”主张的逻辑延伸和实践方案。伯努瓦欧洲主义思想是一种基于现实问题并突破思想畛域的重要尝试，其在现代性批判、“第三条道路”和种族主义上远离了法西斯主义，但其对群体身份的保守认知和对多样性不加批判的赞赏，使得其

* 本文受到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欧洲社会思潮的变化及其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资助（项目批准号：17JJDGJW010）。感谢罗天虹、宋伟、尹继武、闫瑾、梁雪村、李晨、何家丞、李立敏以及《世界政治研究》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笔者文责自负。

** 黄子翊，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更容易被极右翼政治所利用,成为推行排斥论的思想武器。伯努瓦欧洲主义思想对法国“国民阵线”产生了重要的思想与组织影响,同时借助伯努瓦的巨大影响力和“新右派”在各国搭建的跨国网络,其在话语体系、斗争策略和社会环境三个层面上也对欧美极右翼政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阿兰·德·伯努瓦 欧洲主义 反平等主义 “差异的权利” 帝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一体化理论和欧洲联合思想研究中,由于左翼社会民主话语与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①右翼(尤其是激进右翼)的欧洲主义思想长期处于不受重视的边缘地位。由于右翼被视为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天然代言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联合实践直接建立在对法西斯主义政治实践和思想遗产(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与扩张性民族主义)的全盘否定之上,右翼(尤其是激进右翼)在欧洲问题上一度陷入了思想贫瘠和言论失声的危机。不满于左翼的话语垄断并改造性发掘传统右翼的思想资源,以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为首受到葛兰西“霸权”思想影响的一群法国右翼知识分子(其后这群右翼知识分子被称为“新右派”,Nouvelle Droite),自称“右翼葛兰西主义”(right-wing Gramscianism),在20世纪60年代“五月风暴”的浪潮中试图复兴右翼理论、夺取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依托1968年在尼斯成立的“欧洲文明研究学习小组”(Groupement de recherche et d'études pour la civilisation européenne,其缩写“GRECE”在法文中意为“希腊”)以及先后创办的《要素》(*Éléments*)、《新学派》(*Nouvelle Ecole*)、《危机》(*Krisis*)等刊物,“新右派”广泛宣传自身的思想主张,并很快拓展到了英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形成了一个在多国建立组织团体、以多语种进行传播并涵盖学术团体、刊物、出版机构和网站等多载体多媒介的跨国网络,因而也被称为“欧洲新右派”(European New Right, ENR)。

面对冷战以来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并在两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审视欧洲历史

^① Simon Torney, “Visions of a good society: European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age of ideologies and beyond,” in Cristina Flesher Fominaya and Ramón A. Feenstra,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ocial Movements: Protest in Turbulent Times*, London: Routledge, 2020, pp. 19–24.

传统，在诊断欧洲当前危机的基础上通过“元政治”（metapolitics）思索实现欧洲文明复兴与长存的道路^①构成了伯努瓦与“新右派”的核心问题意识与思想主线。“新右派”对于欧洲危机的分析、对于欧洲身份认同的思考以及对于欧洲政治角色和政治架构的设想，既不同于基于普遍主义和当前欧盟体制的欧洲主义，^②也超越了传统右翼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形成了一种基于差异主义的独特右翼欧洲主义思想。但学界对于这种欧洲主义思想的评价却颇为两极化：一部分学者强调其与法西斯思想的继承关系，将其视为一种蓄意为之的新式文化/智识法西斯主义，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可其独特价值，认为其创造了一种超越传统左右之分的新政治范式或是融合了传统右翼遗产和左翼议题的新思想组合。^③那么如何理解伯努瓦这种“看似独特”的欧洲主义的思想实质？是法西斯主义欧洲主义的变体和复现，还是面对新形势的新思考与新方案？

在现实政治中，情况则更为吊诡。尽管伯努瓦反复声明不涉政治，^④且其思想内涵与公认的极右翼意识形态相差甚远，但正是这种“很不极右翼”的欧洲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被认为是“激进右翼政党原型”^⑤的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 FN）的政治纲领与组织动员策略，被视为极右翼政治崛起的重要思想基础。那么又如何理解伯努瓦欧洲主义思想与现实极右翼政治的互动关系，是政治对思想的拨弄和曲解，还是思想成了政治的帮凶？

回顾现有文献，学界（尤其是国外学界）对于以伯努瓦为代表的“新右派”思想已有较为全面和丰富的研究，尤其是围绕其在左右翼政治光谱和法西斯主义

① Jean-Yves Camus, “Alain de Benoist and the New Right,” in Mark Sedgwick, ed. *Key Thinkers of the Radical Right: Behind the New Threat to Liberal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76.

② 这种欧洲主义的代表之一是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在其纪念欧洲公共领域诞生的《2月15日，欧洲人民的团结日：以核心欧洲为起点，缔结共同外交政策》一文中概括的“欧洲共同政治特质”：世俗主义、对国家组织与管理能力的充分信任和对市场功能的怀疑、对技术进步的现实主义期待、福利国家、对于暴力使用的低容忍和在改革的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主义。参见尤尔根·哈贝马斯、雅克·德里达等：《旧欧洲·新欧洲·核心欧洲》，邓伯宸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0页。

③ Tamir Bar-On, *Where Have All The Fascists Gone?*, Hampshire: Ashgate, 2007, pp. 135 - 136.

④ Arthur Versluis, “A Conversation with Alain de Benoist,”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adicalism*, vol. 8, no. 2, 2014, p. 103.

⑤ Cas Mudd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3 - 14.

脉络中的思想定位,^① 学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除了少数概述伯努瓦和“新右派”欧洲主义思想的作品,^② 学界尚缺乏对于伯努瓦欧洲主义思想的专题研究。在欧洲面临多重危机以及危机中极右翼政治势力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再次兴起的当下,重新理解和发掘以伯努瓦为代表的“新右派”欧洲主义思想,在理论层面上有助于我们拓宽对欧洲联合思想的认识,理解激进右翼基于差异主义和群体自主权的欧洲主义观念,进而加深对“民族意识与欧洲意识相互对照交织并矛盾统一在同一欧洲观念中”这一欧洲历史哲学重要特点^③的理解;在现实层面上有助于我们理解欧洲一体化进程逐步涉入国家核心权力和认同政治领域^④后引起的社会反弹^⑤及其在思想领域的表现,进而加深对极右翼政治崛起社会基础的认识。

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以集中阐释伯努瓦欧洲主义思想、被誉为21世纪“新右派”理论纲领的《欧洲复兴宣言》(*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又称《2000年法国新右派宣言》)为中心,结合伯努瓦对于民主、主权、联邦制、身份、传统等问题的论述,通过文本梳理、归纳总结、对比分析,阐述伯努瓦欧洲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分析其思想脉络,并试图揭示其思想实质与现实影响。

一 伯努瓦与“理想欧洲”

伯努瓦旗帜鲜明地批评了以欧盟为代表的当前欧洲联合模式,认为欧盟

① 这一方面的重要作品包括: Tamir Bar-On, *Where Have All The Fascists Gone?*; Tamir Bar-On, *Rethinking the French New Right*,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Roger Griffin, “Plus ça change! The Fascist Pedigree of the Nouvelle Droite,” in Edward J. Arnold, ed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adical Right in France: From Boulanger to Le Pe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pp. 217 – 252 等。

② 如施勒姆巴赫概述伯努瓦和极右翼欧洲主义的专章和巴昂对“新右派”欧洲主义理想的论述,参见: Raphael Schlembach, *Against Old Europe: Critical Theory and Alter-Globalization Movements*, Surrey: Ashgate, 2014, pp. 95 – 114; Tamir Bar-On, *Rethinking the French New Right*, pp. 138 – 183。

③ 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155页。

④ Philipp Genschel and Markus Jachtenfuchs, “From Market Integration to Core State Powers: The Eurozone Crisis, the Refugee Crisis and Integration Theor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56, no. 1, 2018, pp. 178 – 196。

⑤ Hanspeter Kriesi, “Backlash politics against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irst published, August 20, 2020,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1369148120947356>。

“在没有建立欧洲的情况下解构了国家”，并具体指出了欧盟模式存在五点重要不足，即从经济贸易领域而非政治文化领域推进一体化、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地推进一体化、急于吸纳尚未符合入盟标准的东欧国家、未设置欧洲一体化的目标和欧洲的边界、缺乏民众参与。^①在此基础上，他明确反对官僚制和专家治国模式（即超国家的欧洲）以及共同市场模式（即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欧洲经济一体化）。伯努瓦对欧盟模式的批评是对欧洲一体化进程逐步涉入国家核心权力和认同政治并受到重大挑战，而新功能主义与自由政府间主义等主流一体化理论日益无力解释现状并提供方案^②这一时代背景的回音，既体现了对现有一体化思想的吸收和综合（如新葛兰西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地缘政治学和文明冲突论对欧盟东扩的批评等），也为提出自身独特的欧洲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将文明、民族国家和民众三层次统一起来的差异主义欧洲主义）。

与欧盟实践和主流理论的距离并没有使伯努瓦滑向另一个极端，他同样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将欧洲联合视为“各民族的欧洲”（Europe of Nations，即民族主义的欧洲一体化）和建立在种族优越论和同化政策之上的“欧洲民族国家”（European Nation，即法西斯主义的欧洲一体化）。^③这使伯努瓦的欧洲主义思想与民族主义右翼和法西斯主义极右翼的欧洲联合思想也拉开了距离。

在批判总结现有欧洲联合模式的基础上，伯努瓦勾勒了自己眼中的“理想欧洲”：一个反自由主义、主张“差异的权利”（right to difference）、“帝国”的欧洲。以反平等主义和对抗“同一性意识形态”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批判、“差异的权利”和重建“欧洲帝国”的理想构成了伯努瓦欧洲主义思想的核心。在自由主义批判中，伯努瓦认为，以自由主义为当代主要代表、以平等为名抹杀一切差异与多样性的“同一性意识形态”（ideology of the Same）是欧洲所处现代性危机的根源与症结，一个“理想欧洲”各个层面上的敌人（经济层面上的资本主

① Arthur Versluis, “A Conversation with Alain de Benoist,” pp. 92–93; 阿兰·德·伯努瓦：《欧洲整合的新右派方案》，观察者网，转自“法意读书”微信公众号，https://www.guancha.cn/AlainBenoist/2019_04_04_496331_s.shtml。

② Philipp Genschel and Markus Jachtenfuchs, “From Market Integration to Core State Powers: The Eurozone Crisis, the Refugee Crisis and Integration Theor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56, no. 1, 2018, pp. 180–182.

③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London: Arktos, 2012, p. 58.

义与市场社会,哲学层面上的个人主义,政治层面上的普遍主义,社会层面上的资产阶级,地缘政治层面上的美国)^①都是这种意识形态逻辑的外化;他进而提出了一种基于“差异的权利”的欧洲主义:一个理想的欧洲应该是一个尊重个体与群体差异、支持清晰而强大的身份认同的欧洲。但对“差异的权利”的强调并未使伯努瓦滑向他所批判的“民族主义”或“部落主义”(tribalism),相反他认为,基于共同的文明基础(印欧文明)以及应对地缘政治和全球化挑战的需要,欧洲应该联合起来,重建一个在政治上推行联邦制和直接民主、在文化上回归印欧和异教传统的“欧洲帝国”。这三个方面是层层递进的:从对欧洲现状的批判和对欧洲危机的诊断开始,进而提出克服危机的核心理念,最后讨论实现核心理念的政治架构。

二 伯努瓦的自由主义批判:现代性危机与反平等主义

(一)“空位期”:现代性危机与自由主义

伯努瓦的欧洲主义思想是一种建立在对时代问题诊断之上的对理想社会的构想,没有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就没有伯努瓦重建欧洲的构想。在这一意义上,伯努瓦的自由主义批判构成了其欧洲主义思想的背景和基础。

伯努瓦在《欧洲复兴宣言》第一部分“困境”(Predicaments)中将当前时期称为“转折期”或“空位期”(interregnum),这个时期的基本特征是“现代性的终结”(end of modernity)^②。在这一时期,现代性的固有矛盾和内在危机暴露无遗:现代性建立在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之上,但却背离了这两种价值;现代性的其他意识形态(如权利、需求和进步)也充满了矛盾和悖论。^③而现代性危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征则是“意识形态的终结”(end of ideologies)。伴随现代性而生的各种意识形态并不能为解决20世纪人类面对的种种危机提供方案,而工具理性、经济增长与物质性发展只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贫瘠与不确定性带来

① Alain de Benoist, "The European New Right Forty Years Later: Tomislav Sunic's *Against Democracy and Equality*,"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alaindebenoist/pdf/the_european_new_right.pdf.

②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London: Arktos, 2012, p. 5.

③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London: Arktos, 2012, pp. 7-8.

的焦虑的普遍化。现代性带来了一个空虚的文明世界，“一个充满了犯罪、暴力与无礼，人与自身及所处一切都处于战争状态的世界”。^①

在伯努瓦眼中，自由主义是时代危机的症结^②和“新右派”的“首要敌人”。^③他指出，自由主义内含个人主义与经济冲动的二元属性：一方面，自由主义将自由经济的模版推广到道德、政治与社会生活中，使得市场经济沦为市场社会；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产生了现代个人主义。它抽离了人的社会属性，消灭了所有不可量化的动机和与理性计算无关的价值，使人成为只会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单向度的人”并融入一个建立在“普遍权利”之上的社会模式中。个人主义助长了自我中心的疯长，摧毁了建立在民族身份和民族国家之上的价值与意义，使得人陷入虚无主义和犯罪中。个人主义还助长了自恋情绪，它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个体产生了一种虚假的“永恒感”，进而摧毁了社会主体的历史性，带来了社会联结的解体。这种二元属性蕴含着对社会的达尔文式理解：全面的经济竞争与一切人对抗一切人的战争以实现适者生存，^④这无疑是对其声称的自由平等价值的背离。

伯努瓦还批评自由主义否认了政治的特殊性，否定决策的决断性和目标的多元性。他指出，自由主义社会将建立在社会纽带基础上的公民权简化为理性选择基础上的效用，政治成了技术专家对社会的“科学”管理，这种管理的目标不是创造一种“善”的生活模式，而是消解多样生活中的各种冲突。政治家成为特定利益集团的传声筒，而代议制民主日益成为一个因纲领和政策趋于重合而供给日趋有限、因政治热情下降和弃权率上升而需求下降的“市场”。^⑤

①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London: Arktos, 2012, pp. 8 – 11.

②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London: Arktos, 2012, p. 15.

③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London: Arktos, 2012, p. 11; Tomislav Sunic, *Against Democracy and Equality: The European New Right*, London: Arktos, 2011, Part Two: The Egalitarian Mystique-The Roots of the Modern Crisis, Introduction.

④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London: Arktos, 2012, pp. 11 – 12; Alain de Benoist, “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 A Sociological View of the Decay of Modern Society,” Tomislav Sunic, trans.,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alaindebenoist/pdf/gemeinschaft_and_gesellschaft.pdf.

⑤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London: Arktos, 2012, pp. 14 – 15; Alain de Benoist, “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 A Sociological View of the Decay of Modern Society,” Tomislav Sunic, trans.,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alaindebenoist/pdf/gemeinschaft_and_gesellschaft.pdf.

(三) 反平等主义的平等观与“同一性意识形态”

伯努瓦并没有止步于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而是将这种批判深化为对自由主义隐含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剖析和对平等—不平等关系的探讨,并由此推导出针对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方案。

在其首部成名作《右派眼中的世界》中,他将“右翼”定义为“一种一贯的态度,这种态度将世界的多样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相对不平等视为正面、积极的现象,而将受到两千年来平等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和鼓励的世界不断推进的同质化视为负面、消极的现象”。^①这种反平等主义的平等观构成了伯努瓦观察世界的基本观点。伯努瓦从思想观念和政治实践两个层面详细论述了“反平等主义的平等”这个看似矛盾的组合如何代表了“新右派”对于社会现实的真理解。

在概念上,平等一词带有相对性和模糊性。根据定义,两者的平等是基于某种特定标准和根据某种确定关系而产生的相似、同一或等价关系,平等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建立在选定的标准和关系上。平等的相对性和关系性决定了平等与不平等都是相对的,对其判定带有明显的主观性。^②平等主义提出的作为单数概念的平等(与复数概念的不平等相对)不仅在经验现实中缺乏对照物,还显示出平等主义者对平等概念的扭曲和简化,即将平等视为经济意义上可量化的平等^③。不同于比例平等,这种代数平等隐含着无差异的原则。将这种单一适用于经济领域的平等概念应用于整个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将丧失互相区别的差异,也将带来不可量化的人类特性的消失。^④

因而在政治实践中,伯努瓦提出了“民主的平等”(democratic equality)的概念。他指出,虽然现代社会中人类的解放事业更多地与对平等的渴望相关联,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身份平等不太可能实现,也没有必要实现;以平等为名、打着民主化旗号推行的文化标准化大多服务于大公司的利益,机会平等比结果平等更为重要;比平等更重要的是公平。^⑤基于以上认识,他指出,“民

① Alain de Benoist, *View from the Right: A Critical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Ideas (Volume I)*, Robert A. Lindgren, trans., London: Arktos, 2017, p. 20.

② Alain de Benoist, *View from the Right (Volume I)*,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2001), p. 7.

③ Alain de Benoist, *View from the Right (Volume I)*,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2001), pp. 7-8.

④ Alain de Benoist, *View from the Right (Volume I)*,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2001), p. 8.

⑤ Alain de Benoist, *View from the Right (Volume I)*,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2001), pp. 8-9.

主的平等”在本质上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民主指涉的是公民的政治平等，而非自然条件上的平等。^① 作为政治概念，“民主的平等”指示了一种区分，它建立在一个特定政治实体的共同成员身份之上：民主国家的公民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属性上的相同而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而是因为他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这种共同成员身份意味着一种共同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推动了身份认同的形成。这种区分有两重含义：其一，民主的本质属性（或者说基础）是人群（people）而非（普遍性的）人类（humanity），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民主必然是一个群体的民主而不是人类的民主；其二，公民间的平等建立在与非公民的不平等之上。这意味着民主国家的平等只适用于国家内部，而不适用于外部，非公民与“民主的平等”无关。因此，承认人人平等的民主国家将不成其为民主国家。^②

基于对平等与不平等相对关系的认识，伯努瓦指出，单纯地以不平等来反对抽象平等是错误的，平等的反面不是不平等，而是不可度量，在社会中，平等与不平等都不可或缺。^③

伯努瓦对平等主义的分析并没有止步于平等本身。他进一步指出，平等主义话语体系背后潜藏着一种对差异的消解和对同一性的渴望，暗含着对一种“同一性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the Same）的追求。^④

“同一性意识形态”从人的普遍性出发，将这种普遍性视为“同一性”。它将人类普遍平等视为自然而然的平等本身，厌恶一切差异，将所有差异视为暂时和无关紧要的。这种意识形态对人属性的认定带有描述性和规范性两个层面：在描述层面，这种意识形态与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差异相冲突，因此它将差异视为不甚根本的次要特征，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具体差异只是阻碍人认识其本质同一性的各种障碍；在规范层面上，这种意识形态将造成各种差异的原因视为社会上层建筑中暂时性的恶，通过修正这些外部因素，人的内在属性会发生转变，显露出其真实的天性。^⑤

① Alain de Benoist, *View from the Right (Volume I)*,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2001), p. 9.

② Alain de Benoist, *View from the Right (Volume I)*,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2001), pp. 9 – 10.

③ Alain de Benoist, *View from the Right (Volume I)*,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2001), p. 10.

④ Alain de Benoist, *View from the Right (Volume I)*,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2001), p. 10.

⑤ Alain de Benoist, *View from the Right (Volume I)*,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2001), pp. 10 – 11.

伯努瓦将“同一性意识形态”的源头指向了基督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①这种源于基督教并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发展的意识形态不仅成为平等主义的理论基础,更合理化了一系列暴力行为——对外以同一性为名向“落后”群体推行殖民主义,对内压制一切偏离正常规范的行为。这种对同一性的追求在以暴力为基础的极权主义社会或以世界的商品化为形式的“软极权主义”(soft totalitarianism)中达到顶峰。^②

这种普遍主义追求还与个人主义息息相关,因为只有一个个抽象的个体才能组成一个抽象的“人类”,在个体和人类之间的种种中间形式,无论是文化、政治组织还是生活方式,都会摧毁人类的普遍性。这种关联构成了“同一性意识形态”的最大悖论:追求人类统一与团结的理念却造成了人类社会最为严重的解体与社会分裂。这一悖论进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社会组织结构崩塌得越快,失去保护的个体就越需要国家统一干预,而国家的干预又进一步加剧了家庭的解体与社区归属感的丧失。^③

除了与极权主义、个人主义的紧密关联,伯努瓦还指出,从“同一性意识形态”对抽象平等的主张还能推导出“中立原则”(the principle of indifference),即每一种观点都有价值,进而延伸出相对主义以及自由主义关于国家在价值和“善”的问题上保持中立的理论。但这种中立只是表面现象,自由主义并不承认反自由主义的理论的自由主义拥有同等价值,而完全的相对主义在逻辑上便自相矛盾。^④“同一性意识形态”与“差异的权利”完全相对,无法共存。^⑤

伯努瓦的现代性批判呈现出一种层层递进的结构:首先,他将当前(欧洲与世界)的时代危机归结为追求普世主义与同一性的现代性正走向终结。其次,他将现代性危机的症结指向作为现代性主导意识形态、同时也是平等主义理念在当代主要代表的自由主义,指出自由主义所具有的个人主义与经济冲动二元属性造成了其对所追求的自由平等价值的背离;他进一步指出了平等主义对平等概念的空想与曲解,而这种空想与曲解背后暗含着一种对“同一性意识形态”的追

① Alain de Benoist, *View from the Right (Volume I)*,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2001), p. 11.

② Alain de Benoist, *View from the Right (Volume I)*,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2001), pp. 11 – 12.

③ Alain de Benoist, *View from the Right (Volume I)*,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2001), pp. 12 – 13.

④ Alain de Benoist, *View from the Right (Volume I)*,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2001), p. 13.

⑤ Alain de Benoist, *View from the Right (Volume I)*,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2001), p. 14.

求。这种意识形态有其基督教根源，与平等主义、个人主义、相对主义和极权主义关系密切。正是这种对同一性的渴求与对差异的压制构成了现代性危机的深层原因。最后，他指出，现代性的总体性危机，既表征了现代性走向终结，也代表了后现代的肇始。^①新的时代特征决定了要对抗“同一性意识形态”、超越现代性危机，不能依靠主导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也不能靠简单地回归过去，宣扬不平等或诉诸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与族群中心主义，^②而是要在后现代的背景下捍卫世界的多样性，尊重“差异的权利”。

三 欧洲危机的出路：“差异的权利”

“差异的权利”构成了伯努瓦欧洲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核，其中既包含了对“同一性意识形态”压制身份与差异的批判，也体现了伯努瓦对于世界多样性的基本理解，是伯努瓦针对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方案。

（一）作为问题和财富的“差异”

“差异的权利”既是对当代身份认同危机的回应，也反映了对于多样性之于世界重要意义的珍视。一方面，伯努瓦指出，在当代自由民主社会中，身份团体的存在被视为一种问题，身份诉求经常被认为是一种开倒车的落后现象。承认的需要常常被与政治、社会和道德上的落后或者对政治社会团结的威胁联系起来。^③另一方面，伯努瓦认为，世界的多样性是真正的财富。差异使得每个人和每个族群都成为不可替代的独特存在，是人与人类产生联结的特殊方式，也是审视普遍性的基础。^④伯努瓦也是从多样性中理解世界的：在个体层面，人作为人类一员的共同身份必须在某一特定情境中才能得到体现，人与人共享的本质追求会根据时空条件的不同以不同方式加以呈现。因此，多样性是人性本质的一部分；^⑤在社会层

①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pp. 12–13.

② Alain de Benoist, *View from the Right (Volume I)*,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2001), p. 14.

③ Alain de Benoist, “On Identity,” p. 34,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alaindebenoist/pdf/on_identity.pdf.

④ Alain de Benoist, *View from the Right (Volume I)*, 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2001), p. 15.

⑤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London: Arktos, 2012, p. 20.

面, 社会植根于各种共同体之上, 而各种共同体又是由各种联结个体、群体乃至人类间的中间形态所连成的复杂网络组成的;^① 在世界层面, 世界被视为一个多元复合体 (a pluriversum), 多样性是人类发展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②

(二) “差异的权利”: 个体与群体

“差异的权利”可以从个体与群体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在个体层面上, 伯努瓦反对“去差异化”(indifferentiation) 和“去根化”(uprooting), 支持清晰而强大的身份认同。^③ 伯努瓦对身份认同的支持建立在身份属性的全面论述和对重要质疑的澄清之上, 并非简单的口号。

首先, 伯努瓦指出, 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在与他人的沟通中不断动态建构的, 将身份视为不变的本质是一种最容易产生的错误。^④ 这种建构论的观点使伯努瓦远离了“身份血缘论”或者“身份天定论”的传统观点,^⑤ 也使得伯努瓦的身份观与老勒庞 (Jean-Marie Le Pen) 主张的基于自然身份、非历史的、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划清了界线。^⑥ 但伯努瓦并不认同现代性意识形态所主张的更为激进的建构论, 后者将身份问题完全简化为与出身无关的个人选择问题。^⑦ 这种身份的主观性在后现代社会更为突出, 后现代社会的身份变得更具游动性、更分散和更不显著, 身份的确证成为一个情感强化过程。^⑧ 伯努瓦强调, 身份兼具主观性与客观性, 身份的主观性在于主体享有对身份认知、评估和诠释的自主性, 但这种自主性受到所处时空环境的约束, 也即身份客观性的约束,^⑨ 如语言和文化等因素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构成集体认同的关键要素。^⑩ 其次, 伯努瓦也指

①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London: Arktos, 2012, p. 22.

②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London: Arktos, 2012, p. 38.

③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London: Arktos, 2012, p. 45.

④ Alain de Benoist, “On Identity,” pp. 40–41, p. 52.

⑤ Alain de Benoist, “On Identity,” p. 54.

⑥ Franklin Hugh Adler, “Racism, difference and the Right in France,” *Modern & Contemporary France*, vol. 3, no. 4, 1995, pp. 444–447.

⑦ Alain de Benoist, “On Identity,” p. 41.

⑧ Alain de Benoist, “On Identity,” pp. 55–56.

⑨ Alain de Benoist, “On Identity,” p. 42.

⑩ Alain de Benoist, “On Identity,” p. 60.

出了身份的多重性。多重身份的共存使得身份间的冲突几乎无法避免,^①但这并不代表着不同身份间完全不能相容。^②

在群体层面上,对“差异的权利”的理解则更为复杂。一方面,伯努瓦反对将差异视为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与融入的障碍;另一方面,伯努瓦又赞成实现互相承认的最好方式并不是遵循平等原则,而是遵循等级原则。

伯努瓦详细地分析了将差异视为障碍的论证逻辑。他指出,这一观点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其一是社会中的个体越平等,他们之间便越相似,他们之间的融合便越容易;其二是将仇外情绪与种族主义视为恐惧他者的产物。伯努瓦指出了两个假设的错误性:就第一个假设而言,种族主义恰恰是平等主义理想的病态产物;就第二个假设而言,仇外情绪并不单单来自于对他者的恐惧,而更多是来自对同一的恐惧。对同一的恐惧引起了无目的的模仿性对立,而在现代社会中,平等主义正是这些对立的动力来源,每个人都想比别人“更平等”。与此同时,对他者的恐惧加剧了对同一的恐惧,产生了无穷无尽的镜面反射效应。^③

伯努瓦并没有详细论述如何以等级原则指导群体关系,而是引用法国哲学家杜普(Jean-Pierre Dupuy)的论述指出,等级制并不是不平等,而是既反对平等,也反对不平等;在真正的等级制社会中,较为优越的部分并不支配较为低下的部分,只是在组成原则上有所不同,或者说一部分在构成上和整体的内部连贯性上优先于另一部分。^④根据都铎(Lucian Tudor)的延伸解释,这意味着在承认多样性和差异的价值、赞赏并从其他群体的差异中学习的同时,并不全然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世界上的各个群体,^⑤因为身份意识本就暗含了对于同群体的一种自然偏好。^⑥为了维持族群和文化身份的独特性,需要维持族群和种族的某种同质性,反对不正常的不同种族间的混合,以维持族群文化的稳定与个体对族群的归

① Alain de Benoist, “On Identity,” p. 41.

② Alain de Benoist, “On Identity,” p. 46.

③ Alain de Benoist,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Lucian Tudor, trans., *The Occidental Observer*, 13 – 14 September 2014,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alaindebenoist/pdf/identity_and_difference.pdf.

④ Alain de Benoist,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Lucian Tudor, trans., *The Occidental Observer*, 13 – 14 September 2014,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alaindebenoist/pdf/identity_and_difference.pdf.

⑤ Lucian Tudor, “Ethnic and Racial Relations: Ethnic States, Separatism and Mixing,” <https://www.counter-currents.com/2014/03/ethnic-and-racial-relations/>.

⑥ Alain de Benoist, “On Identity,” p. 46.

属感,需要维持与外部的相对隔离,保持有限度的对外交流。^①

伯努瓦反对将民族主义作为实现“差异的权利”的理想政治框架,他认为,民族主义在政治和文化上将“民族”概念绝对化,雅各宾式民族国家建立在本土区域文化差异的消亡之上。“差异的权利”意味着对群体和共同体的相互尊重以及对彼此价值的赞赏,既倡导尊重本土和区域族群或亚族群的身份,又承认更大规模的族群与文化关系及联合的重要性。^②

伯努瓦将“差异的权利”视为回应身份认同危机的理想方案。他指出,肯定“差异的权利”是避免两个错误的唯一方式,一重错误常见于左翼,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必须在牺牲差异、侵蚀文化和共同体的同质化基础上才能实现;另一重错误常见于右翼,认为“民族的重生”必须通过向其成员灌输对他者的排斥态度才能实现。^③

(三)“差异的权利”与移民问题

基于对“同一性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对身份和差异的支持,伯努瓦形成了其对移民问题的独特思考。

在移民问题的成因上,伯努瓦指出,移民并不应该为移民问题负责,相反移民是移民问题的主要受害者,而将人商品化的工业化国家才应对移民问题负责。离家迁移在本质上代表了一种强制性的“去根”模式。这种模式首先是由经济因素推动的,即人会从人口过多的穷国自发或有组织地迁往富裕国家;其次是由象征因素推动的,即在消费导向的生活方式不断扩张的背景下,西方文明对于其他地区的人民产生了独特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还带来了本土文化的贬值。^④经济因素推动的迁移使得移民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后备军,被迫接受

① Lucian Tudor, “Race, Identity, Community,” https://www.counter-currents.com/2013/08/race-identity-community/?__cf_chl_jschl_tk__=790fb69bd8e5fcb88b040d05028d44a39fc11a4-1587533782-0-AeXTPmM_n3HDlOK6rU90WAXLVRLLRaevLI89Pp_OwU_CA52-2AA1Hc7oFdQqo6XJYfVEp_d5NReSvHqNhS4xxvHQxwVLUnHCx2HNKctv-4XILKH0AhaYIFns0iopYYf4WVB2R1_LbP9bMS31-gY_25ftOSIGr1AcsDIP6XWf6Ey0qi10zvYvJKIcBKil825Aq6Lq1Kg-q9yykZ9s8-flk8upD9lLnrrul9HtyzjGxpM48F35LhFveUO-HivWCNK0Vco6GT4wUSmL4mtXRmMYloNsfntddACg-Tbqq3xIy19qzfkBSFaoiSndeyV4E3sp-eBxA.

② Lucian Tudor, “Ethnic and Racial Relations: Ethnic States, Separatism and Mixing,” <https://www.counter-currents.com/2014/03/ethnic-and-racial-relations/>.

③ Alain de Benoist,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Lucian Tudor, trans., *The Occidental Observer*, 13–14 September 2014,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alaindebenoist/pdf/identity_and_difference.pdf.

④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London: Arktos, 2012, p. 50.

资本主义的过度剥削。^①而作为少数群体，移民受到所处社会多数群体行为方式的压力，其身份只能通过消极反抗的方式加以存留和实现，或是被迫消失，或是以极端方式被激化。进一步而言，伯努瓦反对将移民作为造成法国认同危机的“替罪羊”。他指出，在某些方面，认同危机与移民并无关系，法国乃至欧洲身份认同的丧失，其主因是世界的技术—经济同质化，其主要载体是带有跨国性质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移民并非危机的原因，而是危机的后果。^②

在移民政策上，伯努瓦并不反对采取限制移民的政策，但他强调应与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合作，帮助它们克服全球化带来的不平衡，保护有机的相互依存与当地传统的生活方式。对于那些已经在法国定居的移民，伯努瓦反对“国民阵线”等极右翼政党提出的强制驱离政策，也反对推行强制同化。他主张应当公开承认移民所具有的独特族群文化身份并推行社群主义模式。在这一模式下，移民不需要放弃他们原有的文化，只需要遵守一些一般通行的法律。^③

三 承载“差异”的理想框架：“欧洲帝国”

伯努瓦的“欧洲帝国”理想是对“差异的权利”的逻辑延伸和实践方案。他认为，民族国家并不是实现“差异的权利”的理想政治框架，只有一个回归欧洲精神传统、采取联邦制与直接民主的“欧洲帝国”才能实现对内维护差异与身份、恢复欧洲的文化自信，对外联合其他文化对抗自由主义霸权与“同一性意识形态”的欧洲复兴理想。

（一）对民族国家的批评与反思

伯努瓦的“欧洲帝国”理想建立在对民族国家的批评与反思之上，而这种批评与反思又建立在对构成现代民族国家基础的两大原则——民族主义与主权观

① Alain de Benoist, “Immigration: The Reserve Army of Capital,” Tom Sunic, trans.,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alaindebenoist/pdf/immigration_reserve_army_of_the_capital-anglais.pdf.

② Alain de Benoist,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Lucian Tudor, trans., *The Occidental Observer*, 13–14 September 2014,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alaindebenoist/pdf/identity_and_difference.pdf.

③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London: Arktos, 2012, pp. 50–52.

念——的批判性理解之上。

伯努瓦从两个方面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定义:^①其一,民族主义代表一个群体自愿组成或恢复成一个“民族”(nation)的愿望(通常是面临一个威胁其集体认同的环境);其二,民族主义代表一种认为政府应该优先甚至仅仅服务于本民族利益的政治学说。他指出,这两种定义展现了民族主义的矛盾性。第一种定义将民族主义视为对外部冲击的一种反应,其本质与冲突相连,而敌人的多样性使得民族主义具有高度可塑性,可以与各种立场与各个时期的意识形态相结合。第二种定义中“民族利益”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与冲突相连的民族主义本质使得这一概念只能在面对威胁与敌人时才变得清晰而有意义。

除了民族主义概念的模糊性,伯努瓦还指出,“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是一种带有强烈现代色彩的政治工具,是对集体认同的一种工具化建构。^②在概念建构的历史过程中(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中),“民族”摧毁了旧制度下的各种中间纽带,将民族国家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作为民族一份子的个体主体性与优越感的确立又带来了族群中心主义与普世主义的弥赛亚意识。个人对民族的排他性崇拜也会造成不同民族间陷入“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竞争。

在伯努瓦看来,民族和民族主义只是确认与维护集体认同的一种方式。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建构与民族主义对内消解了群体与社会组织的多样性,对外带来了族群中心主义与对其他群体的敌意与排斥,沦为了“新右派”一直强烈反对的“部落主义”,并非捍卫身份与差异的理想模式。^③

对主权观念的批判则反映了伯努瓦对于政治共同体内部各组成单元与整体关系的深入思考。与民族主义相似,伯努瓦将现代意义上的主权概念视为一种建构,并强调了博丹(Jean Bodin)与雅各宾派的影响。他指出,在博丹的主权观念中,主权是共同体绝对和永久的权力(这种绝对权力在霍布斯那里得到了强化),是一体而不可分割的;主权与政治社会的概念不可分割,它废除了特定的联系和忠诚,铲除了社会成员与政府权力间的各种中介,使得主权者(在博丹

① Alain de Benoist, “Nationalism: Phenomenology and Critique,”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alaindebenoist/pdf/nationalism_phenomenology.pdf.

② Alain de Benoist, “Nationalism: Phenomenology and Critique,”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alaindebenoist/pdf/nationalism_phenomenology.pdf.

③ Alain de Benoist, “Nationalism: Phenomenology and Critique,”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alaindebenoist/pdf/nationalism_phenomenology.pdf.

那里指的是君主)与人民相对隔离,联结两者的已不是具体的社会纽带,而是抽象的政治契约。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方面,君主主权转移到了“人民”之上,而带有具体社会意义的“人民”被抽象建构的“民族”所取代。主权者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民族”的不可分割性,排除了一种将民族视为由不同群体与政治文化实体组成的观点。另一方面,《人权宣言》中对个人普遍权利优先性的强调挑战了主权的绝对性,催生了自由主义理论中从法律与普遍人权出发对主权的限制。^①从以上对主权观念发展变化的梳理与分析中,可以延伸出伯努瓦对于自由主义主权概念的两个主要批评:其一,对主权的限制否认了政治事务的特殊性与首要地位;其二,以抽象的“人民”或“民族”概念承载的主权概念压制了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差异与多样性。

施密特和阿尔图修斯(Johannes Althusius)对伯努瓦的主权观和帝国理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受到施密特“例外状态论”启发,反对生活的“去政治化”,反对将政治视为社会其他领域的附属品,主张应当摒弃将政治视为“中立”或者退化为“对物的管理”(administration of things)的做法,重拾追求“善的生活”的古典理想。^②

阿尔图修斯更是直接塑造了伯努瓦对于“欧洲帝国”的设想。不同于博丹,阿尔图修斯将人视为社会动物和社会联系的一部分,进而讨论个体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在这一视角下,社会契约不再如自由主义理论所主张的是个人意志的结果,而是一个基于相互归属感(mutual belonging)通过共生性交流(a process of symbiotic communication)形成的整合联盟(an integrating alliance,拉丁语 *foedus*)。在这种交流过程中,更大规模的政治实体由较小的共同体组成,其合法性和行为能力也来自这些较小共同体的自主权。而公共行为(或者说政治)的目标便在于指定与区分这些参与共同体自主权与互相联合的层次与程度,划分整体事务与个别事务的界线。对于阿尔图修斯而言,主权永恒地存在于共同体中,源自人们自我统治的自主权,不可限制也不能放弃。由于更大规模政治实体的主权来自较小共同体的委托,阿尔图修斯式的主权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可以分配与共享的,权力在各个层次上被代表与委托。主权并不是一个全能的权威,而只是代

^① Alain de Benoist, “The Modern Conception of Sovereignty: A Jacobin Invention,”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alaindebenoist/pdf/question_of_sovereignty.pdf.

^②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London: Arkos, 2012, pp. 25 – 26.

表行为能力最强的一个权力层次。不同于博丹对于主权结构金字塔式的理解,阿尔图修斯的主权结构意味着多样性、自主权以及不同层次权力与权威的交织。^①伯努瓦将“欧洲帝国”设想为一个由各享有自主权的自治群体以联邦制组织起来的政治实体,并在政治决策上采用辅助性原则^②,这恰恰体现了阿尔图修斯式主权的重要影响。

基于对现代民族主义与主权观念的批判性理解,伯努瓦指出,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尊重并保护身份与差异,欧洲应将自身组织成一个“联邦制帝国”。^③

(二) 作为政治原则与精神原则的“帝国”

伯努瓦并没有在《欧洲复兴宣言》中直接提及“帝国”这一概念。这种缺失并不是对“帝国”概念的轻视,而是恰恰反映了伯努瓦对“帝国”概念的理解。在伯努瓦的论述中,^④“帝国”与民族国家的首要区别便在于“帝国”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想和原则,并非一块领土。政治秩序的差异是由精神原则和法律理念决定的,而非物质因素或对某一地理区域的占领,因而认为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差别在于地理规模的观点是错误的。帝国的权威来自道德和精神上的优越性,而非政治与法律权力。

“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另一重差异在于对待政治联合的态度。“帝国”的联合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有机联合,而非机械联合。“帝国”只是设想了超越民族国家层面的联合,但并不强制实现这种设想。与在形成过程中形成了自身文化并试图使民众接受这种文化的民族国家不同,“帝国”支持文化的多样性,在联系不同群体的同时并不试图改变他们的特性。换言之,“帝国”代表了一种在单一与多元、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寻找和谐,尊重自主权与多样性的原则。“帝国”所追求的更高层次的联合并不以压制文化、族群特性和群体的多样性为代价。

① Alain de Benoist, “What is Sovereignty?”, Julia Kostova, trans., pp. 111 – 115,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alaindebenoist/pdf/what_is_sovereignty.pdf.

② 即决策应由受决策影响最直接的人做出。

③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London: Arktos, 2012, pp. 57 – 58; Lucian Tudor, “Ethnic and Racial Relations: Ethnic States, Separatism and Mixing,” <https://www.counter-currents.com/2014/03/ethnic-and-racial-relations/>.

④ Alain de Benoist, “The Idea of Empire,”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alaindebenoist/pdf/the_idea_of_empire.pdf.

“帝国”拥有不同于民族国家的开放性。民族国家是一种封闭性政治建构，个体的民族身份是公民权的基础，也有较为明确的边界。而“帝国”并不要求个体脱离其自然纽带，“帝国”的公民依然可以保有其他民族身份，“帝国”的边界也是流动和临时的。“帝国”是一种将人们联合起来建立公平秩序的理想，没有普遍主义追求，也不试图创造任何建立在强制改变和标准化上遵奉同一政治法律原则的“世界国家”（world-state）。

伯努瓦指出，在民族国家日益受到来自上层（国际体系）和下层（国内社会）的压力与挑战、陷入危机时，“帝国”原则指导下的联邦模式是欧洲的唯一出路。^①

作为一种原则的“帝国”可以从政治与精神两个方面加以具体理解。

作为政治原则的“帝国”体现为在“帝国”的组成单元之间推行联邦制，在组成单元内部推行直接民主。^②伯努瓦认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对于解决小的问题，民族国家规模太大，对于解决大的问题，民族国家规模太小，欧洲必须将自己以联邦制组织起来才能应对全球化的各种挑战。联邦制以辅助性原则为核心，即较低层次的权威只有在所处理事务超出其处理能力的情况下才能将权威委托给较高层次的权威。这种联邦制应该在各个层次施行，不只在成员国之间，也在成员国内部，每个层次的地位和作用都应该受到尊重。在伯努瓦看来，只有那些涉及全体人民和联邦整体的事务才应该由联邦来决定，这些事务包括外交、军事、重大经济问题、基本的法律问题、环境保护等。在研究、工业和传媒领域的联合是必要的，而单一货币则必须置于受到政治权威控制的中央银行管理之下。^③

在各个层次的决策中，伯努瓦认为，应当采用参与式的直接民主以体现全体人民的意愿与同意。伯努瓦对直接民主的支持建立在他对现代民主危机的批判和古代希腊、日耳曼民主传统的回归上。^④他认为，民主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或者自由主义的议会民主，也不必然与政党产生联系。民主是指一

① Alain de Benoist, “The Idea of Empire.”

② Alain de Benoist, “The Idea of Empire.”

③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London: Arktos, 2012, pp. 57 – 59.

④ Alain de Benoist, “Democracy Revisited: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alaindebenoist/pdf/democracy_revisited.pdf.

一个作为群体的人民享有主权的制度，人民享有的主权并不因为代议制和多数决原则等技术因素而消失。人民享有的平等的民主权利并不来自于他们的自然权利，而来自于他们对于同一政治实体的共同归属，民主的本质与核心在于公民的政治联合。民主必须建立在构成其权力合法性来源的群体中，并努力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形成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即人民通过其行动有机会参与到公共生活中。面对人民的淡出，伯努瓦指出，恢复民主精神的真正办法在于在各个层次建立真正的参与式民主，让每个公民都参与到对“共同的善”的追求中来。^①

作为精神原则的“帝国”体现为对传统的回归。伯努瓦对传统的理解受到了古内(René Guénon)、埃弗拉(Julius Evola)、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等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的影响。传统主义者认为，传统不是一套习惯体系，不是一套广泛接受和遵守的规则体系，而是一套自愿自觉传为原则的教义——一系列关于永恒价值和并非源于人类的超越性真理。传统的文化意义只是第二位的，首要的是其精神意义。传统带有宗教特性并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是影响所有人的一个连贯的无形神圣原则的体系，它勾画了行为的必要准则，使得人能够上升到超人类的层面，使得人得以脱离大地，从人间秩序上升为神圣秩序。^② 具体而言，伯努瓦想要回归的传统是印欧传统与异教主义传统。^③ 其中印欧传统的核心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杜梅泽尔(Georges Dumézil)提出的“印欧意识形态”中的“三元结构”。这种“三元结构”展示了印欧社会的社会分工结构，即祭司代表的宗教与司法权力、战士代表的军事权力以及农民代表的经济权力。^④ 这种

①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pp. 59 – 62; Alain de Benoist, *The Problem of Democracy*, London: Arktos, 2011, pp. 151 – 203; Alain de Benoist, *Democracy and Populism: The Telos Essays*, Russel A. Berman and Timothy W. Luke, eds., Candor, New York: Telos Press Publishing, 2018, pp. 163 – 171.

② Alain de Benoist, “Tradition?”,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alaindebenoist/pdf/tradition.pdf>.

③ 这两种传统在对抗平等主义与同一性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是相近的，但印欧传统更侧重文化人类学意义，代表了一种更具体的欧洲社会生活形式与政治传统，而异教主义传统更侧重哲学与神学意义，反映了不同于犹太—基督教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考。由于本文侧重于论述伯努瓦的政治思想，限于篇幅，将不对异教主义传统进行详述，其相关论述参见 Alain de Benoist, *On Being a Pagan*, Jon Graham, trans., Michael Moynihan, ed., North Augusta, South Carolina, US: Arcana Europa, 2018.

④ Alain de Benoist, “Priests, Warriors, and Cultivators: An Interview with Georges Dumézil,” Joshua Buckley, in Collin Cleary and Michael Moynihan, eds., *TYR: Myth-Culture-Tradition (Volume 1)*, Atlanta, Georgia, US: ULTRA, 2002, pp. 41 – 50; Alain de Benoist, *View from the Right (Volume I)*, pp. 16 – 21. 对于印欧传统的全面论述，参见 Alain de Benoist, *The Indo-Europeans: In Search of the Homeland*, Aaron Cheak, trans., London: Arktos, 2016.

传统暗含了（以平等主义与同一性意识形态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若干要素：对等级制的肯定、政治的首要地位、政治与宗教的结合以及政治对经济的控制。

（三）“欧洲帝国”的地缘政治

伯努瓦在对当前世界局势分析的基础上，勾勒了“欧洲帝国”的地缘政治构想。伯努瓦指出，21世纪的世界体系将是一个多元文明组成的多极世界，这些文明包括欧洲文明、北美文明、南美文明、阿拉伯穆斯林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等。^① 这些文明并没有取代古代延续下来的本土、部落、地域或民族身份，但会成为人类身份之外最终的集体认同形式。而这一世界体系的最大威胁在于某些文明的普世主义追求与“文明使命”。^②

伯努瓦的地缘政治构想带有鲜明的反美、反西方色彩。这种以反美为核心的反西方主义在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层面上都有所体现，既是其自由主义批判的自然延伸，也反映了法国地缘政治思想的影响。他指出，西方向普遍主义的转向使得其陷入了全面危机，捍卫欧洲意味着反对“西方”。^③ 美国不仅是自由主义普世主义与商品拜物教的代表，在地缘政治上还是推行新殖民主义、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新帝国主义。伯努瓦反对“北约”在冷战后的继续存在。他指出，维系“北约”的存在体现了美国的三重意图：其一是为推行新殖民主义干涉提供便利，其二是让欧盟放弃组建欧洲自主共同防卫力量，其三是破坏西欧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伯努瓦主张应加强与俄罗斯的大陆联系，依托欧亚大陆陆权对抗美国的海权。^④ 此外，伯努瓦还将第三世界非西方文化视为共同对抗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的盟友，鼓励非西方文化加强文化自信以对抗普世主义的侵蚀。^⑤

① 这种文明划分可以看出伯努瓦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关联性。

②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pp. 40 - 41.

③ Alain de Benoist, “The ‘West’ should be forgotten,” Tomislav Sunic, trans.,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alaindebenoist/pdf/the_west_should_be_forgotten.pdf.

④ Alain de Benoist, “Geopolitics today,”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alaindebenoist/pdf/geopolitics_today.pdf.

⑤ Raphael Schlembach, *Against Old Europe*, pp. 100 - 101; Alberto Spektorowski, “The French New Right: multiculturalism of the right and the recognition/exclusionism syndrome,” *Journal of Global Ethics*, vol. 8, no. 1, 2012, pp. 50 - 51.

四 评价伯努瓦：独特右翼思考还是极右政治帮凶？

伯努瓦欧洲主义思想经常被归于极右翼阵营或被贴上“新法西斯主义”的标签，但将其与极右翼核心意识形态^①相对照后，不难发现伯努瓦其实很不“极右翼”，甚至与其截然相反：伯努瓦言辞激烈地批评了民族主义；自诩为差别主义的反种族主义；主张开放和对话的身份观，反对排外主义；支持人民主权和直接民主；反对雅各宾式民族国家，支持区域和群体的自主权。在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上，似乎也很难给伯努瓦扣上极端主义者的帽子：伯努瓦坚持“元政治”的文化斗争，反对一切对现实的静止理解和简化论^②，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惧症”（phobia），^③ 在使用敌我辩证法中，将朋友概念置于敌人之前。^④ 这些做法与极端主义宣扬暴力和直接行动、对世界二元对立的简单理解、树立敌人和诉诸“恐惧政治”（politics of fear）等一般印象大相径庭。“标签”与“内容”的错配使得对伯努瓦欧洲主义思想的（再）评价有其重要意义，这种（再）评价并不是单纯的“贴标签”或“去标签”，而是将伯努瓦思想置于所处的政治社会与思想环境中进行重新解读。

（一）伯努瓦与法西斯主义：旧瓶新酒还是分道扬镳？

在施加给伯努瓦及其思想的众多标签中，“法西斯主义”是其中内涵最丰富、关系最复杂也最具政治杀伤力的一个。某种程度上，关于评价伯努瓦思想的辩论可以化归为评判伯努瓦思想是不是法西斯主义思想的争论，因为诸如“反犹主义”“种族主义”等其他标签的评判大多都以两次世界大战间法西斯主义作为原型并联系到法西斯主义思想遗产，而对伯努瓦的重新解读又绕不开对其与法西斯主义关系的辨清与厘正。

① 穆德在总结了26种关于右翼极端主义的定义和其中至少58种特征后指出，右翼极端主义通常具有五种共同特征：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反民主和强国家。参见 Cas Mudde, “The war of words defining the extreme right party family,” *Western European Politics*, vol. 19, no. 2, 1996, pp. 225–248.

② Arthur Versluis, “A Conversation with Alain de Benoist,” pp. 96–97.

③ Alain de Benoist, “Phobies en tous genres et point Godwin; l’Etat se defend comme il peut,” March 3, 2014. <http://www.bvoltage.fr/phobies-en-genre-points-godwin-letat-se-defend-il-peut/>.

④ Arthur Versluis, “A Conversation with Alain de Benoist,” pp. 99–100.

在对伯努瓦思想法西斯主义性质的批评中，巴昂的论断集中反映了英文学界对于作为一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法西斯主义的理解，颇具代表性。巴昂将伯努瓦思想称为“人道的法西斯主义”，将其视为延续两次世界大战间法西斯主义遗产并进行改造使之适应战后反法西斯时代的新型法西斯主义。^① 概括而论，巴昂的论断建立在伯努瓦及其思想与法西斯主义的组织联系和思想联系上。在组织联系上，巴昂强调了伯努瓦及“新右派”与法国、意大利新法西斯主义组织之间的人员往来和思想交换。在思想联系上，巴昂指出，伯努瓦思想符合格里芬提出的法西斯主义“最小化定义”（Fascist Minimum），^② 在很多特征上符合佩恩（Stanley Payne）在法西斯主义理念清单上的描述。^③ 他还列举了诸多关于“新右派”的专题研究，指出“新右派”的“差异的权利”、超越左右的努力等思想与法西斯主义主张的“第三条道路”、种族主义等理念存在关联，并将“新右派”思想的新特性（如“右翼葛兰西主义”）和复杂性认定为“新右派”采用的迷惑和欺骗策略。^④

巴昂的论断失之简单与草率。首先在组织联系上，“新右派”早期与新法西斯主义组织的联系是历史事实，但以此断言伯努瓦和“新右派”在近半个世纪后仍然法西斯主义“遗毒不散”则是一种刻舟求剑的静态视角，忽视了各个时期伯努瓦和“新右派”的思想发展与转变。伯努瓦甚至指责巴昂这种以组织联系为“新右派”贴标签的行为是一种“麦卡锡主义式”的“连坐”（guilt by association）^⑤。其次在思想联系上，对于“新右派”与法西斯主义延续性的认定也过于简单。将“新右派”的复杂性和创新性单纯视为一种生存策略，如果说不是是一种智识上的懒惰和一厢情愿，那也是不够客观的。^⑥ 巴昂的论断过度依赖格

① Tamir Bar-On, “Alain de Benoist: Neo-fascism with a human face?”, Conference paper in the discussion of “Cross-border Concepts of the radical Right” in the conference “Unlimited Right-wing Extremis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and Counter-strategies” by German Federal Agency for Civic Education, Munich, 2015, p. 14.

② 即重生的神话、民粹式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堕落的神话，参见 Roger Griffin, *The Nature of Fascism*, London: Routledge, 1991, p. 201.

③ Tamir Bar-On, “Alain de Benoist: Neo-fascism with a human face?”, pp. 15 – 16; 关于佩恩的法西斯主义清单，参见 Stanley G. Payne, *A History of Fascism, 1914 – 1945*, London: UCL Press, 1995, p. 7.

④ Tamir Bar-On, “Alain de Benoist: Neo-fascism with a human face?”, pp. 14 – 17.

⑤ Arthur Versluis, “A Conversation with Alain de Benoist,” p. 104.

⑥ 加缪在论及伯努瓦对于塔吉耶夫提出的“混交恐惧”的回应时，坦诚但又不失谨慎地指出，当伯努瓦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惧症”时，他“似乎是真诚的”。参见 Jean-Yves Camus, “Alain de Benoist and the New Right,” p. 78. 伯努瓦特别指出巴昂对其宣扬“故弄玄虚”话语策略（doublespeak）的指责，将其列为巴昂不诚实和断章取义的重要例证。参见 Arthur Versluis, “A Conversation with Alain de Benoist,” p. 105.

里芬和佩恩的定义,也遭到了质疑。^①

从著名法西斯主义研究专家、历史学家诺尔特(Ernst Nolte)对法西斯主义在政治实践、政治原则(意识形态)和“元政治”思想三个层次的分类^②上看,伯努瓦思想在政治原则层面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是其中的核心问题。本节的后半部分将重点讨论伯努瓦思想与现代性、“第三条道路”、种族主义这三种与法西斯主义紧密联系的思想范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回到以法西斯主义辩论为核心的伯努瓦思想评价上来。

(1) 伯努瓦与现代性:球形时间观下对现代性的超越

巴昂将“新右派”思想视为一种对现代性替代方案(alternative modernity)的探索。这种探索建立在对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政治和哲学思想被格里芬称为“迷宫式的重组”的颇为矛盾的拼凑之上。巴昂反对将“新右派”思想视为“反动”“陈旧”和“反现代”的。与之相反,他主张应该在更广义的现代主义框架中理解“新右派”思想。他指出,“新右派”诞生于现代,吸收了现代和后现代诸多思想;虽然“新右派”对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诸多方面提出了批评,但仍然在现代性框架内提出了对欧洲危机的解决方案;“新右派”虽然否定了现代性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但并不反对现代性带来的科技进步;“新右派”也明确指出其并不试图回归到前现代社会。以上四个原因使得“新右派”思想仍然处于现代主义框架中,是一种针对现代性危机的革命性解决方案。^③

伯努瓦对巴昂的论断提出了批评和纠正,如强调并没有全盘否定法国大革命的思想遗产,而是有选择性地加以汲取。^④但这种更正并没有从根本上质疑将伯努瓦思想视为一种对现代性替代方案的革命性探索的基本论断,必须指出的是,伯努瓦和“新右派”所持有的独特的时间观使得“新右派”对于现代性替代方案的理解可能与巴昂的论述不甚相同。

受到尼采—海德格尔哲学、传统主义和异教主义的影响,伯努瓦坚持“球

^① Arthur Versluis, “A Conversation with Alain de Benoist,” pp. 80–81; Roger Eatwell, “On defining the ‘Fascist Minimum’: The centrality of ideology,”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vol. 1, no. 3, 1996, pp. 308–312. 关于法西斯主义定义的讨论,参见 Roger Griffin, Werner Loh, and Andreas Umland, eds., *Fascism Past and Present, West and East: An International Debate on Concepts and Cases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xtreme Right*, Stuttgart: ibidem-Verlag, 2014.

^② Ernst Nolte, *Three Faces of Fascism*, Leila Vennewitz, trans.,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69, p. 537.

^③ Tamir Bar-On, *Rethinking the French New Right*, pp. 81–109.

^④ Arthur Versluis, “A Conversation with Alain de Benoist,” pp. 82–83.

形”（spherical）时间观，反对线性时间观。这种时间观反对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视为一段有方向有目的的历史的不同时期，而是将其视为每一个生活时刻的永恒维度。换言之，对于伯努瓦和“新右派”而言，过去、现实与未来都在意义网络中以相互交织或者相互叠加的状态呈现在现实时间中。^① 在这种时间观下，在现实中重视传统和展望未来并不是对前现代的回归或者是一种对各个时期思想有意识的综合与拼接，而是打破同一性意识形态后对世界真实状态的复现。这种真实在时间维度上体现为主张宽容多元的异教精神（多神教）而非对异教信仰本身的重现，^② 在空间维度上则体现为以同一性为基础的现代性终结后，各个文明和文化群体在差异和多样性中共存的“多重后现代性”（multiple postmodernity）。笔者认为，这种解读才最能体现伯努瓦在其现代性批判中蕴含的对超越现代性的理解（即“回到过去并不能实现对现代性的超越，要超越现代性只能通过使某些前现代价值以一种完全后现代的方式重现”^③）。

（2）伯努瓦与“第三条道路”：尊崇多样性的精神右翼

伊特维尔在“最小化定义”中将法西斯主义主张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视为其四大核心特征之一。^④ “新右派”超越左右分野的努力常常被研究者与法西斯主义“非左非右”（neither right, nor left）的主张联系起来，成为指控其法西斯主义性质的重要证据。

巴昂对伯努瓦与“新右派”的左右属性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他指出，在继承保守革命派思想遗产的同时，“新右派”吸收了大量“新左派”思想，使得两者在超越建制意识形态、支持直接民主和社群主义等方面拥有共同立场，但从对人类本质、历史进程和理想社会政治架构的理解看，两者又存在重大差异。^⑤ 巴昂进一步指出，伯努瓦反平等主义的立场、对普遍人权和代议制民主的反对以及其对异教式精英统治的鼓吹使其更接近右翼而非左翼。^⑥

①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pp. 41–44.

② Arthur Versluis, “A Conversation with Alain de Benoist,” pp. 94–95.

③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p. 11.

④ Roger Eatwell, “On defining the ‘Fascist Minimum’,” pp. 313–314.

⑤ Tamir Bar-On, *Rethinking the French New Right*, pp. 51–60.

⑥ Tamir Bar-On, “Intellectual Right-Wing Extremism: Alain de Benoist’s Mazeway Resynthesis Since 2000,” in Uwe Backes and Patrick Moreau, eds., *The Extreme Right in Europe: Current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Göttingen, Germany: Vandenhoeck and Ruprecht, 2011, pp. 333–358; Tamir Bar-On, “The French New Right: Neither Right, nor Left?,”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adicalism*, vol. 8, no. 1, Spring 2014, pp. 1–44.

巴昂的论断遭到了伯努瓦激烈的反驳。首先,他指出,“新右派”思想站在左右两边(both right and left),^①代表一种超越过时的左右分野、对一切真理开放的努力。^②接着,他和巴昂关于平等与平等主义、普遍人权与移民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争论(伯努瓦认为所谓异教式的精英统治纯属子虚乌有):伯努瓦指出巴昂混淆了平等与平等主义,误读了波比欧(Norberto Bobbio)对于左右分野与平等关系的论断,错误地指责“新右派”反对法理平等(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equality),“新右派”并不反对人权,只是反对“人权意识形态”;^③巴昂则指出,伯努瓦反对在道德和法律上保卫人权与自由,偏向族群特殊主义、反对普遍主义,而对移民的负面评价以及与合理化“保守革命派”等做法都使“新右派”更接近右翼。^④

两人的争论是相当混乱的,夹杂了对对方观点和作品的误读、对其他论著的断章取义以及对相同概念的不同理解,这里仅对针对伯努瓦思想的指控加以厘清。整体而言,巴昂的批评并不客观,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伯努瓦的反平等主义不同于波比欧所定义的反平等主义(anti-egalitarianism),而是反对将一切视为等同的“绝对平均主义”(egalitarianist)。在波比欧的定义中,区分左右翼的平等主义(egalitarian)与反平等主义(anti-egalitarian)是一种相对的态度,前者认为人的共同点价值更大,现实中的不平等大多是一种社会现象,能够被消除;后者认为人的多样性价值更大,现实中的不平等大多是一种自然现象,无法消除。^⑤伯努瓦的反平等主义并未脱离伯克以降保守主义在平等与差异问题上的基本立场,^⑥其思想并未挑战近代自由—平等主义政治框架下的政治平等概念(其核心为公民平等),只是在政治以外的领域反对平等原则的扩张和坚持差异原则。^⑦伯努瓦思想更接近右翼,并不是

① Alain de Benoist and Christine Rhone, “Alain de Benoist Answers Tamir Bar-On,”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adicalism*, vol. 8, no. 1, Spring 2014, p. 146.

② Alain de Benoist, “The European New Right Forty Years Later.”

③ Alain de Benoist and Christine Rhone, “Alain de Benoist Answers Tamir Bar-On,” pp. 146 – 150.

④ Tamir Bar-On, “A Response to Alain de Benoist,”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adicalism*, vol. 8, no. 2, Fall 2014, pp. 146 – 150.

⑤ Norberto Bobbio, *Left and R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Distinction*, Allan Cameron, tra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 60 – 71.

⑥ 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第298—299页。

⑦ 唐士其:《政治中的差异与平等》,《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77—88页。

因其反对法理平等（这是反民主的极右翼政治主张），而是因其对多样性的尊崇。

其二，伯努瓦对作为道德和法律概念的普遍人权的批评是建立在将政治平等/民主平等视为首要平等的基础上的。在伯努瓦看来，人首先是某个群体中的人（在政治上是某个共同体中的人），而不是人类的一份子或者一个世界公民。^① 因此在政治上，人权首先是共同体内的公民权，这种公民权的决定和授予基于共同体在政治上的同质性，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能通过道德和法律加以论证，与巴昂提到的权利保障无关。公民权建立在公民间的平等与公民—非公民间的不平等之上，自然与共同体相关联，带有特殊主义色彩，而非普遍施于每一个人。如果将反对普遍主义、偏向特殊主义作为伯努瓦思想靠近右翼的标准，则社群主义思想也将被视为右翼思想，这显然是不妥的。

其三，巴昂将伯努瓦对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视为其靠近右翼的证据，这无疑是武断的。伯努瓦对于造成移民现象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批评带有鲜明的左翼色彩，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也不仅仅来自右翼。^②

其四，伯努瓦对施密特、埃弗拉等人的思想虽有继承（如伯努瓦继承了施密特“帝国”思想中以民族反对普遍主义的意涵，与埃弗拉都认同国家应是围绕主权原则组织起来的有机的等级制社会，并都承认神话在维系社会身份与精神纽带上的作用），但也有重要的转变与突破（如伯努瓦将施密特的“帝国”思想建立在强调维护族群和区域多样性的反殖民主义与反帝国主义论说之上，伯努瓦在神话、身份认同与国家等问题上也采取了更为强调主体意愿的唯意志论，不同于埃弗拉主张的决定论）。^③ 将伯努瓦对这些被认为合理化暴力和为法西斯主义摇旗的作者的积极评价和对其思想的合理吸收视为其更接近右翼的证据，似乎有

①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pp. 19–22, 33–36, 45–47.

② Steven Vertovec, and Susanne Wessendorf, “Introduction: Assessing the backlash against multiculturalism in Europe,” in Steven Vertovec and Susanne Wessendorf, eds., *The Multiculturalism Backlash: European discourse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London: Routledge, 2010, pp. 1–31.

③ Thomas Sheehan, “Myth and Violence: The Fascism of Julius Evola and Alain de Benoist,” *Social Research*, vol. 48, no. 1, 1981, pp. 58–73; Danilo Zolo, “Contemporary Uses of the Notion of ‘Empire’,” *The Monist*, vol. 90, no. 1, 2007, pp. 48–64; Danilo Zolo, “The re-emerging notion of Empire and the influence of Carl Schmitt’s thought,” in Louiza Odysseos and Fabio Petito,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ought of Carl Schmitt: Terror, Liberal War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 154–165.

违巴昂深入研究和重新评价伯努瓦思想的初衷。

除了尊崇多样性的价值偏好外,伯努瓦思想在精神气质上也更为接近右翼。伯努瓦认同保守和革命之间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的关系,但从伯努瓦思想的基本特质上看,伯努瓦对社会政治架构的设想较为革命和激进,而其对于人和自然的理解则偏于保守。即便是这种激进,在伯努瓦看来,也应该回归到“理解事物的根源”这一最初意义上加以理解。^①吉布森更是指出,相较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伯努瓦在《欧洲复兴宣言》中对于人和社会的理解趋于保守化,在精神上更接近了埃弗拉和伊利亚德。^②借用富勒(Steve Fuller)基于对“人类潜能”(human potential)的理解重新划定的左右翼概念,伯努瓦因为其坚持的“预防性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而归于右翼阵营。^③

关于伯努瓦思想左右翼性质的辩论也展现出当代理解和定位极右翼思想的复杂性:右翼核心概念的多元性和模糊性、^④右翼思想与当代议题的亲缘性(如生态学和身份政治)、社会科学对于左右翼关系的简单理解、^⑤右翼社会支持基础^⑥

① Arthur Versluis, "A Conversation with Alain de Benoist," pp. 82 - 83.

② Matthew Gibson, "Responses to Modernity: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Five Right-Wing European Thinkers in the Twentieth and Twenty-First Centuries," PhD dissertation,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16, pp. 341 - 382.

③ 富勒指出,基于对人类潜能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对风险原则的不同态度将重塑21世纪的左右翼差异。面对风险,在社会心理上,预防主义者(precautionary)的重点是防止最坏可能结果的出现,而主动主义者(proactionary)的重点是宣传最好的可能机会;在形而上学上,预防主义者在现实世界和其他可能的世界之间划分了明确的界限,而主动主义者愿意牺牲部分现状来换取将来的可能性。(左派中的)社群主义者和(右派中的)传统主义者将占据预防性主义一端,而(左派中的)技术统治论者和(右派中的)自由主义者将占据主动性主义的一端。这种左右划分很好地解释了伯努瓦思想中传统主义与社群主义的结合。参见S. 富勒:《二十一世纪意识形态系谱的新左派和新右派——预防性原则与主动性原则》,钟林译、舒年春校,《世界哲学》2013年第6期,第116—125页; Steve Fuller and Veronika Lipinska, *The Proactionary Imperative: A Foundation for Transhuman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p. 12 - 43.

④ Roger Eatwell, "The Nature of the Right: Is There an 'Essentialist' Philosophical Core?," in Roger Eatwell and Noël O'sullivan, eds., *The Nature of the Right: European and American Politics and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1789*,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89, pp. 47 - 61.

⑤ Roger Eatwell, "The Rise of 'Left-Right' Terminology: The Confusions of Social Science," in Roger Eatwell and Noël O'sullivan, eds., *The Nature of the Right: European and American Politics and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1789*,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89, pp. 32 - 46.

⑥ 随着传统小资产者和蓝领工人政治影响力的下降以及个体经营者与白领的增加,左右翼意识形态的支持者不再以财产进行划分,而是以其职业的结构性和专业技能的可迁移性划分。这种支持者结构的转变使得极右翼政党的经济纲领从支持新自由主义转向了支持福利沙文主义。参见Herbert Kitschelt, "Social class and the radical right: Conceptualizing political preference formation and partisan choice," Jens Rydgren, ed., in *Class Politics and the Radical Right*,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 224 - 251.

与潜在盟友的变化^①以及新政治分野的出现^②对于左右翼分野的重塑。

(3) 伯努瓦与种族主义：反种族主义话语与种族化实践

伯努瓦思想中的“差异的权利”与“欧洲帝国”引起了关于伯努瓦思想与种族主义联系的讨论。有学者认为，“差异的权利”代表了一种不同于“国民阵线”等极右翼政党的对当前认同危机与移民问题的思考。^③但更多学者认为，“差异的权利”及其“帝国”理想只是“换了新瓶的旧酒”，并不能掩盖其背后种族主义与排他主义的实质，其中以塔吉耶夫与斯佩克托罗夫斯基的批评最具代表性。

塔吉耶夫认为，“新右派”“差异的权利”的主张创造了一种“差异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宣扬尊重他者的亲外精神（*xenophile*），而不是仇视他者的排外主义（*xenophobia*）。这种自称“反种族主义”的“新种族主义”具有不同于传统种族主义的两个新特征：其一是放弃群体间的不平等主张，转而主张文化间差异的绝对化和群体间的相对隔离（一种基于文化本质论的绝对文化相对主义）；其二是放弃（生物学与体质人类学意义上的）种族概念，转而使用（社会/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族群和文化概念，从生物学种族主义转向文化种族主义。但差异主义保护集体身份与群体间差异、反对（物理和文化意义上的）跨群体杂交的主张，恰恰反映了其“混交恐惧”的核心内涵，而这种“混交恐惧”在本质上与维护种族纯洁性的主张并无二致。^④

斯佩克托罗夫斯基在塔吉耶夫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他将这种新式的种族主义称为“亲族群的排他主义”（*ethnophilian exclusionism*），这种排他主义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宣扬种族排他主义（*race exclusionism*）与对异族群的恐惧（*ethnophobia*）转向文化差异主义（*cultural differentialism*）与对异族群的亲善（*ethnophile*）。出于对其他文化和身份的尊重，“新右派”反对对移民的融入，反对将其视为种族主义政策的法国共和同化模式，也反对对迁入国本土人民

① 面对“伊斯兰威胁”，主张世俗主义的左翼和宗教右翼（包括极右翼）结成了“神圣同盟”。参见 Olivier Roy, *Secularism Confronts Islam*, George Holoch,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如教育、经济与文化现代化、全球化等，参见 Simon Bornschieer, “Globalization, Cleavages, and the Radical Right,” in Jens Rydgre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Radical Ri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12–238.

③ Franklin Hugh Adler, “Racism, difference and the Right in France,” pp. 447–448.

④ Pierre-André Taguieff, “From Race to Culture: The New Right’s View of European Identity,” *Telos*, no. 126, Winter 1993, pp. 100–101.

与移民的身份认同均构成重大威胁的自由主义式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新右派”支持非西方文化培养其文化自信,但这种文化自信应当仅限于非西方文化自身的环境中,不应与培养欧洲文化的自信相冲突。欧洲的文化自信应当建立在一个文化同质、免于移民影响的欧洲之上。在培养文化自信、重建文化认同上,欧洲与其他非西方文化的共同敌人是美国代表的自由帝国主义。^①

斯佩克托罗夫斯基进一步指出,“新右派”利用了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漏洞,创造了一种“差异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differentialist multiculturalism)。借由兼具多元主义与反自由主义双重意涵的“差异”(la différence)概念,“新右派”得以挑战平等主义共和传统下的公民权概念。“新右派”还将“承认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作为导向排斥论的关键。承认的需要与对文化差异的尊重首先推导出隔离外来群体的需要,接着又合理化了排斥行为:为了尊重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差异,应将他们送回到(可以保护和维持其身份与差异的)原有的文化与自然环境中。这一逻辑构成了“新右派”的“承认/排斥”模式。^②

伯努瓦批评了塔吉耶夫提出的“差异种族主义”概念。首先,在方法论层面上,对于“差异主义话语”(differential discourse)的解读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对言外之意的解读既复杂,又容易陷入循环论证。其次,在概念方面,将“差异”视为一个绝对概念构成了自相矛盾:差异只有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才存在,将差异视为绝对概念则意味着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差异”或者“差异主义话语”;自愿的分离行为也不能称作“种族隔离”。最后,在实践上,“差异种族主义”使得反种族主义陷入了困境。如果种族主义可以兼具亲外性和排外性,反种族主义将无所适从。^③

在此基础上,伯努瓦提出了对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的理解。他指出,种族主义不是对族内通婚的偏好(这是一种自然偏好和个人选择)。种族主义理论的核心是相信人类种族、文化与文明间存在不平等的信念,并不一定与对种族与种族等

① Alberto Spektorowski, "The French New Right: Differentialism and the Idea of Ethnophilic Exclusionism," *Polity*, vol. 33, no. 2, Winter 2000, pp. 284 - 286.

② Alberto Spektorowski, "The French New Right: multiculturalism of the right and the recognition/exclusionism syndrome," pp. 46 - 47.

③ Alain de Benoist, "What is Racism?" pp. 44 - 45, https://s3-cu-west-1.amazonaws.com/alaindebnoist/pdf/what_is_racism.pdf.

级的生物学解释，种族身份决定个人价值与历史走向的种族决定论，对支配、排斥或隔离的合理化，对种族混合的反对以及认为不平等无法改变的信念等理念必然相关。^① 种族主义是一种错误的理论，这种理论根植于科学实证主义和社会进化论（两者都是现代性的产物）。^② 在对反种族主义的理解上，伯努瓦区分了普遍主义的反种族主义与差异主义的反种族主义，并指出前者因为试图将差异简化为同一性的同化主义立场而在实质上与种族主义无异。伯努瓦认为，差异主义的反种族主义从承认差异出发，进而努力恢复普遍性的积极意义，是真正的反种族主义。反种族主义并不意味着要否定种族概念的存在，也不意味着将所有种族融合为一个不加以区分的整体，而是要一边反对排斥，一边反对同化。^③

对伯努瓦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论述的理解，必须置于塔吉耶夫所指出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形”（the metamorphoses of the ideological field）中。而这种变形体现为关于种族主义共识的瓦解与意识形态因素的强化、科学界对于遗传决定论的意见分化以及“新右派”主张的以文化为基础的差异种族主义和“国民阵线”宣扬的建立在民粹话语之上的民族种族主义的出现。这三种变化带来了种族主义话语在三个方面的重塑：其一是文化、宗教、传统、心理乃至特定象征物的“种族化”（racialization）；其二是从不平等话语转向差异话语；其三是“迂回”（retortion）策略的系统性使用。^④ 在此基础上，达波洛尼亚（Ariane Chebel d' Appollonia）指出，种族主义可以是“无种族”的，可以指以某种象征的形式指称对任何差别的激进化（的看待和对待），认为绝对的相异性不可改变的观点。伯努瓦主张的差异主义之所以属于种族主义，是因为它对文化和差异的本质化理解。^⑤

以上论断仍有所不足，因为伯努瓦本人曾鲜明地反对对身份的本质化理解以及将“差异的权利”绝对化、原教旨主义化的解读。^⑥ 伯努瓦虽然承认身份兼具

① Alain de Benoist, “What is Racism?” p. 31.

②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London: Arktos, 2012, pp. 47–48.

③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London: Arktos, 2012, p. 49.

④ Pierre-André Taguieff, *The Force of Prejudice: On Racism and Its Doubles*, Hassan Melehy, trans. and e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pp. 1–18.

⑤ 阿丽亚娜·舍贝尔·达波洛尼亚：《种族主义的边界——身份认同、族群性与公民权》，钟震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第28—29页。

⑥ Alain de Benoist, and Christine Rhone, “Alain de Benoist Answers Tamir Bar-On,” p. 156.

主客观性并承认多重身份的存在,但在论述“差异的权利”和移民问题主张时的一些倾向使其更接近了种族化的政治实践(如果不是种族主义本身的话)。这些倾向包括:先验地认定群体身份的存在并假定群体身份先于个体身份;^①对于某些带有明显社会建构色彩的群体归属概念较少批判,^②呈现出维持现状的较保守态度;将社会问题归于某一特定群体^③等。

这些倾向在政策主张中的外化也使得伯努瓦主张的等级原则更接近了排外主义。一方面,他支持社群主义模式,反对对现有移民的强制驱离与强迫同化,支持超越民族身份的公民权;但另一方面,他又支持群体间的文化差异与相对隔离,^④支持对非公民的不平等。在伯努瓦的政策主张中,移民看似享有选择的自由,但只是作为移民的一员,选择或是被隔离、不平等地生活在迁入国(个体作为非公民的不平等,而非群体间的不平等),或是回到原籍国维持原有生活与身份的自由。

作为“差异的权利”的实践方案与承载框架,伯努瓦的“欧洲帝国”理想试图在帝国框架下对内建立一个“各族群的欧洲”,对外重建欧洲文明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并与各文明文化平等共处。

一方面,虽然这一思想继承了法西斯主义与战后初期新法西斯主义对欧洲联合的思考,^⑤融合了法西斯主义欧洲理想中族群中心论和重生论的核心主张,^⑥被视为是对探索超越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普世意识形态的欧洲“第

① 伯努瓦曾指出,移民可以选择不接受移民这重身份,但必须选择一种身份,而不是单纯反对某种身份,但从伯努瓦对群体身份偏于保守的态度看,这种对身份确证主体意义的强调,更多的只是一种不甚有力的辩解。参见 Alain de Benoist, “‘We Are at the End of Something’ -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Interview with Alain de Benoist,” 22 November 2013,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alaindebenoist/pdf/we_are_at_the_end_of_something.pdf.

② 如对于公民权的血缘主义理解、男性气概与女性气概的分立等。

③ 如将犯罪率上升、社会不稳定、族群关系紧张等问题归于移民和移民现象。参见 Arthur Versluis, “A Conversation with Alain de Benoist,” p. 101.

④ Alain de Benoist, “Confronting Globalization,” John Lambeth and Deborah Shair, trans.,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alaindebenoist/pdf/confronting_globalization.pdf.

⑤ Tamir Bar-On, “Fascism to the Nouvelle Droite: The Dream of Pan-European Empir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vol. 16, no. 3, 2008, pp. 327 - 345; Tamir Bar-On, “Fascism to the Nouvelle Droite: The quest for pan-European empire,” in Andrea Mammone, Emmanuel Godin and Brian Jenkins, eds., *Varieties of Right-Wing Extremism i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2013, pp. 69 - 84; Alberto Spektorowski, “Fascism and Post-National Europe; Drieu La Rochelle and Alain de Benoist,”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33, no. 1, 2016, pp. 115 - 138.

⑥ Gerard Delanty, *Inventing Europe: Idea, Identity, Reality*, London: Macmillan, 1995, pp. 100 - 114.

三条道路”的延续,^①但其以文明为中心的欧洲联合理念与各族群文化间平等的主张,又使其远离了狭隘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及主张族群优越论的传统帝国论,^②具有其独特性与较强的开放性。^③伯努瓦的“帝国”理想也因其与左翼帝国论者共享的反对美国霸权和新自由主义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主张,而被施勒姆巴赫视为提供了一种针对“华盛顿共识”“现实存在”(至少是可以想象的)的替代方案。^④

但另一方面,“欧洲帝国”理想中存在的多种张力也使得其在政治实践中极易滑向扭曲和变态。这些张力包括:对(政治)权力绝对主义和反平等主义的理解与以辅助性原则为基础的直接民主与联邦制主张间的张力(或者说施密特式主权观与阿尔图修斯式主权观间的张力),对帝国传统多元性的肯定^⑤与对深远影响欧洲文化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三大一神教传统的摒弃间的张力,主张帝国内部以印欧传统为主体的各族群文化平等与缺乏(法国、德国等霸权国家存在下)如何协调和保障大国与小国、大族与小族、更大范围认同与小群体认同间关系原则的张力,^⑥帝国边界的开放性与文明边界的相对封闭性间的张力以及追求欧洲地缘政治地位与反对帝国主义政策之间的张力。在这些张力作用下的“欧洲帝国”虽不至于成为自诩“山巅之城”的“美帝国”,但却有可能蜕变为对内事实上承认大族的支配地位、挤压少数群体和少数认同,对外推行“欧洲优先”和相对孤立的“欧洲堡垒”。

(二) 总结:无辜的思想?危险的实践?

总而言之,伯努瓦的欧洲主义思想代表了一种结合左右翼思想、在当代议题

① Alberto Spektorowski, “The New Right: ethno-regionalism, ethno-plur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o-fascist ‘Third Way’,”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vol. 8, no. 1, 2003, pp. 111 – 130; Alberto Spektorowski, “Ethnoregionalism, Multicultural Nationalism and the Idea of the European Third Way,”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7, no. 3, 2007, pp. 45 – 63.

② Duncan Bell, “Ideologies of Empire,” in Michael Freeden, Lyman Tower Sargent and Marc Stear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538 – 543.

③ 与同属“新右派”但在立场上更为激进的法耶(Guillaume Faye)相比,伯努瓦的“帝国”概念更少突出族群的中心地位以及帝国对内对外关系中的冲突性,展现出更大的开放和包容。参见 Alain de Benoist and Charles Champetier, *Manifesto for a European Renaissance*, p. 58; Guillaume Faye, *Why We Fight*, London: Arkot, 2011, pp. 267 – 270.

④ Raphael Schlembach, *Against Old Europe*, pp. 112 – 114.

⑤ Alain de Benoist, “On Identity,” pp. 50 – 51.

⑥ Danilo Zolo, “Contemporary Uses of the Notion of ‘Empire’,” pp. 48 – 64; Danilo Zolo, “The re-emerging notion of Empire and the influence of Carl Schmitt’s thought,” pp. 154 – 165.

下重新发掘传统思想资源的思想尝试,其思想体系虽然不免庞杂、模糊甚至自相矛盾,但其对现实问题的敏锐把握和对思想畛域的大胆突破无疑是重要且值得肯定的。尊崇多样性的精神与对世界理解及思想争鸣较为开放的态度使得伯努瓦欧洲主义思想不管在原则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远离了法西斯主义。

但这种开放性是相对的,伯努瓦思想中对于群体身份较为封闭保守的认知以及对多样性不加批判的赞赏,使得其更容易被极右翼政治所利用,成为推行排斥论的重要思想武器。虽然伯努瓦一再强调“新右派”与政治无涉,^①但其强烈的时代意识和现实关怀使得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现实政治中。而且当伯努瓦“差异的权利”成为“国民阵线”“国民优先”的口号、本土主义的呼吁成为渲染“伊斯兰威胁”的武器、思想自由的主张成为极右翼借用反犹主义打压左翼和移民知识分子的保护伞时,很难说这些政治实践只是对政治思想的歪曲,而不是对其思想倾向和思维方式的延伸和转置。

五 极右翼政治中的伯努瓦欧洲主义

(一) 伯努瓦与“国民阵线”:组织与话语

虽然自成立伊始,“新右派”便致力于以思想来影响当前和未来的政治文化精英,这种影响也有所成效(如伯努瓦获邀为《费加罗杂志》撰稿、希拉克政府的内政部长接受了“新右派”的某些主张),^②但伯努瓦思想对于法国政党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对“国民阵线”思想和组织的影响上。

20世纪80年代一批“新右派”成员加入了“国民阵线”,形成了与天主教原教旨主义者、贝当主义者、新法西斯主义者、莫拉斯式民族主义者并列的“国民阵线”内部的一个小集团。^③

一方面,“新右派”成员的出走反映了伯努瓦思想与“国民阵线”主张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首先体现在移民与种族议题上。^④伯努瓦思想为“国民阵线”

① Arthur Versluis, “A Conversation with Alain de Benoist,” p. 103.

② J. G. Shields, *The Extreme Right in France: From Pétain to Le Pen*,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 154–157.

③ Tom McCulloch, “The Nouvelle Droite in the 1980s and 1990s: Ideology and Entryism,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Front National,” *French Politics*, no. 4, 2006, p. 176.

④ Harvey G. Simmons,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The Extremist Challenge to Democracy*,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6, p. 208.

提供了“差异的权利”“反法国的种族主义”（anti-French racism）等新话语，^①尤其是“国民优先”（national preference）、“反法国的种族主义”这两个口号成为“国民阵线”为其移民政策辩护的核心话语。^②随着“国民阵线”的经济政策从新自由主义转向市场监管与社会保护，伯努瓦从反自由主义出发的反美主义也得到了“国民阵线”的认可。^③伯努瓦思想也为“国民阵线”提供了新的反法西斯主义、反极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话语。^④“国民阵线”与伯努瓦代表的“新右派”思想间有着诸多共同特征：对自由民主、自由主义、社会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厌恶；摒弃多元文化主义社会，支持“欧洲人的欧洲”；希望终止向欧洲大陆无节制的移民政策；捍卫与历史相关联的同质化的族群身份和仪式；对强人领袖和等级制社会的偏好；对平等主义哲学的批判，认为其催生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同质化的、“单一世界”（one-world）文明；对欧盟当前制度的拒斥；地缘政治层面强烈的反美主义情绪。^⑤

另一方面，“新右派”成员的出走也反映了伯努瓦思想与“国民阵线”的明显差异。伯努瓦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国民阵线”主张的批评与不满。加入“国民阵线”的“新右派”成员多数不满伯努瓦固守文化斗争的策略，试图在政治舞台上大展身手，加入“国民阵线”后也与伯努瓦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国民阵线”对“新右派”思想的引入造成了党内的不满，更为1998年党内分裂埋下了隐患。^⑥1990年起，伯努瓦与“国民阵线”之间进入了公开敌对阶段。伯努瓦代表的“新右派”思想与“国民阵线”主张存在鲜明的差异：“新右派”主张异教主义，而“国民阵线”则持有亲基督教的立场；“新右派”主张泛欧主义，而“国民阵线”坚守更狭隘的法兰西民族主义；“新右派”主张法国国内各群体享有维持现有生活的权利（包括穆斯林使用清真寺和戴头巾的权利），而“国民阵线”持反穆斯林的立场；“国民阵线”只关注回应安全关切和执迷于身

① Tamir Bar-On, *Rethinking the French New Right*, p. 214.

② Tom McCulloch, “The Nouvelle Droite in the 1980s and 1990s: Ideology and Entryism,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Front National,” pp. 167 – 169.

③ Tom McCulloch, “The Nouvelle Droite in the 1980s and 1990s: Ideology and Entryism,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Front National,” pp. 174 – 175.

④ Tamir Bar-On, *Where Have All The Fascists Gone?* p. 174.

⑤ Tamir Bar-On, *Rethinking the French New Right*, p. 214.

⑥ Tom McCulloch, “The Nouvelle Droite in the 1980s and 1990s: Ideology and Entryism,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Front National,” pp. 167 – 169.

份的话语,并未与“新右派”认为“是一个摧毁族群的制度”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做切割;“新右派”对“优越性”持唯意志论和贵族式的理解,而“国民阵线”则带有明显的“军事化氛围”。^①

维亚尔(Pierre Vial)这位曾担任“欧洲文明研究学习小组”秘书长、后又加入“国民阵线”的“新右派”成员的事例最能说明伯努瓦思想对“国民阵线”的复杂影响。维亚尔1988年加入“国民阵线”,1990年成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94年进入政治局。他创办了名为《土地与人民》(*Terre et peuple*)的公报,并借此传播“新右派”思想。《土地与人民》支持“人民的事业”(cause of peoples),并主张停止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以推动“欧洲优先”;它试图为即将到来的“认同主义至上革命”(identitarian revolution)培养领袖;它强调“总体的族群战争”(total ethnic war),并将犹太人视为所有欧洲族群的公敌,因为犹太人是所有现代普世主义意识形态的拥趸。1995年,维亚尔成为代表“国民阵线”的欧洲议会议员。维亚尔是“国民阵线”时任总干事梅格(Bruno Mégret)的支持者。在20世纪90年代末党内发生分裂时,他站在了梅格阵营一边公开挑战老勒庞的领导地位。^②维亚尔代表了“新右派”阵营中思想更为激进的分支,他将伯努瓦与“新右派”关于身份、差异与族群的思想引入“国民阵线”,并将其政治化、口号化、行动化,使之更能适应政治动员的需要。维亚尔为代表的“新右派”成员的加入使得“国民阵线”党内斗争复杂化,其政治和组织影响也随着“国民阵线”的分裂而消减。

伯努瓦思想的影响还伴随着媒体传播与公共辩论延伸到整个法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蒙东指出,“新右派”长期的文化斗争为“国民阵线”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而“国民阵线”代表的新民粹主义与“新右派”代表的新种族主义又在关于世俗化和共和的辩论中逐步打破了政治禁忌,使得质疑移民、质疑伊斯兰教与穆斯林、质疑多元文化主义逐渐进入到主流政治中,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常识。^③

① Tamir Bar-On, *Rethinking the French New Right*, p. 215.

② Tamir Bar-On, *Rethinking the French New Right*, pp. 220 - 221; Tamir Bar-On, *Where Have All The Fascists Gone?* pp. 173 - 174.

③ Aurelien Mondon, “The French secular hypocrisy: the extreme right, the Republic and the battle for hegemony,” *Patterns of Prejudice*, vol. 49, no. 4, 2015, pp. 392 - 413.

（二）伯努瓦与极右翼政治：新话语、新策略、新环境

伯努瓦思想对欧洲以及欧洲以外极右翼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话语体系和斗争策略上。

在英国，“新右派”的代表人物沃克（Michael Walker）引入以伯努瓦为代表的法国“新右派”思想，冲击了英国极右翼长期坚守的被称为两头“圣牛”（sacred cows）的生物学种族主义与阴谋论思想。伯努瓦思想影响了英国新法西斯主义组织“国民阵线”（the British National Front）的转型，并最终影响了格里芬（Nick Griffin）对“英国民族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的改造。格里芬对极权主义的批评、对分权和直接民主的支持、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都能看出伯努瓦思想的影响。^① 在意大利，“北方联盟”（Lega Nord）构建“帕达尼亚”（Padania）的努力为伯努瓦的族群多元主义与文化排斥论提供了政治与经济实例。^② 在德国，“新右派”采用了伯努瓦提倡的文化斗争形式，伯努瓦对于文化、身份、传统的论述以及对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深刻影响了德国“新右派”的思想主张。^③

俄罗斯“新右派”和“新欧亚主义”代表人物杜金（Alexander Dugin）与伯努瓦和“新右派”关系密切，在与“新右派”的联系中深化了对古内和埃弗拉等传统主义者的理解。^④ 杜金与伯努瓦在反对美国霸权、主张欧洲与俄罗斯更紧密关系的地缘政治理念上有共同点，^⑤ 伯努瓦还对杜金提出的超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第四种政治理论”表现出高度兴趣。^⑥ 霍利（George

① Nigel Copsey, “Au Revoir to ‘Sacred Cows’?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the Nouvelle Droite in Britain,” *Democracy and Security*, vol. 9, no. 3, 2013, pp. 287 – 303.

② Alberto Spektorowski, “Ethnoregionalism: The intellectual new right and the Lega Nord,” *Global Review of Ethnopolitics*, vol. 2, no. 3 – 4, 2003, pp. 55 – 70.

③ Roger Woods, *Germany’s New Right as Culture an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④ Anton Shekhovtsov, “Alexander Dugin and the West European New Right, 1989 – 1994,” in Marlene Laruelle, ed., *Eurasianism and the European Far Right: Reshaping the Europe-Russia Relationship*,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15, pp. 35 – 53.

⑤ Marlene Laruelle, “Alexander Dugin and Eurasianism,” in Mark Sedgwick, ed., *Key Thinkers of the Radical Right: Behind the New Threat to Liberal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55 – 169.

⑥ Arthur Versluis, “A Conversation with Alain de Benoist,” pp. 83 – 85; Alain de Benoist, “The Fourth Dimension,” Tomislav Sunic, ed.,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alaindebnoist/pdf/the_fourth_dimension.pdf.

Hawley) 则指出, 美国的“另类右翼”(alt-right) 受到了“欧洲新右派”的重要思想影响, 如对平等主义的批评和与种族主义的暧昧关系。^① 欧洲极右翼与美俄极右翼通常被视为相互较为独立的极右翼群体, 而上述提及的思想联系反映了“激进右翼思想网络”中逐渐加强的“跨大陆联系”和“跨大西洋联系”。伯努瓦和“新右派”思想对于新自由主义、美国霸权、全球化以及当前欧盟制度的批评以及“差异的权利”的主张为作为一种反全球化运动的极右翼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② 代表了一种以身份与差异为基础重塑国际秩序的“反动的国际主义”(reactionary internationalism)。^③

巴昂指出, 极右翼民粹政党政治动员中的常见主题与伯努瓦和“新右派”思想有颇多相似之处。这些主题包括: (1) 民族主义; (2) “黄金时代”的神话; (3) 抵制现有政党与政治精英; (4) 对直接民主(如全民公投)的支持和对代议制民主的批评; (5) 呼吁普通民众反对被视为内部同质且具有破坏性的精英群体; (6) 与厌恶“政治正确”相结合的富有侵略性的民粹主义; (7) 对于异族间通婚或者本民族、欧洲人或白人在人口结构上的衰退的谴责; (8) 煽动仇外情绪和反对移民的运动; (9) 拒绝多元文化主义和对外国人的融入, 限制向外国人授予国籍; (10) 排斥或遣返移民、寻求庇护者或者“经济难民”; (11) 强调本族和外族文化互相渗透的风险, 主张族群多元主义; (12) 本民族优先, 限制向外国人发放福利; (13) 宣扬主张强国家、拒绝抽象的人权意识形态并将责任置于权利之前的威权主义纲领; (14) 认为外国人需要对犯罪和恐怖主义负责的安全意识形态; (15) 主张引入更为严厉的法律和维持秩序措施, 如对于恐怖分子、毒贩和恋童癖的死刑; (16) 呼吁道德复兴, 反对道德消解带来的堕落(如同性恋); (17) 与反官僚制和反税主张相结合并通过社会保障和反对私有化实现的经济保护主义; (18) 对欧洲一体化的敌意(因为欧盟被设计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 在这个国家内各民族、议会和各文化将失去其自主权);

① George Hawley, “The European Roots of the Alt-Right: How Far-Right Ideas Are Going International,”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27, 2017,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europe/2017-10-27/european-roots-alt-right>. 关于“另类右翼”与“欧洲新右派”的思想联系, 详见 George Hawley, *Making Sense of the Alt-Ri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② Andrej Zaslove, “Exclusion, Community, and a Populist Political Economy: The Radical Right as an 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no. 6, 2008, pp. 169–189.

③ Pablo de Orellana and Nicholas Michelsen, “Reactionary Internationalism: the philosophy of the New Righ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5, no. 5, 2019, pp. 748–767.

(19) 一个克里斯玛型领袖；(20) 媒体的关注等。^①

伯努瓦和“新右派”还将一些新议题带入讨论，并引入了新的话语体系与话语策略。这些新议题包括：(1) 移民制度的失败、其对民族身份的危险和左右翼建制派政党对其的默示支持；(2) 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带来的文化标准化和本土欧洲文化的丧失；(3) 为了本地和本土文化利益而停止移民；(4) 在福利、就业和公民权方面执行国民优先政策；(5) 当前的欧盟制度削弱了国家主权并使得各民族和区域文化趋于同质。被极右翼政党借用的话语策略包括：(1) 属于各文化的“差异的权利”，包括法兰西的法国人（French French）为了保护其文化独特性而决定其移民制度与废弃多元文化主义的权利；(2) “真正的种族主义者”是那些高举自由左翼旗帜、支持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试图建立单一世界的人，因为他们试图通过市场与国家使各种文化趋于同质；(3) 认为右翼是自由左翼政治和文化精英所坚持的偏见、思想控制以及将新自由主义视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思想的受害者。^②

总而言之，伯努瓦思想对于极右翼政治的影响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其一是话语体系。伯努瓦的欧洲主义思想使右翼（尤其是极右翼）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脱离法西斯主义的窠臼，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极右翼政治思想的贫瘠状态，创造性地发掘了两次世界大战间法西斯主义以及激进右翼的历史遗产^③并将其与当代政治议题结合起来，^④ 奠定了战后极右翼政治新母题（master frame）的理论基础，^⑤ 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轮极右翼崛起提供了思想支撑；其二是斗争策略。伯努瓦的欧洲主义思想代表了一种“右翼葛兰西主义”的“元政治”思考，^⑥ 代表了右翼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不同于政党政治和街头政治的第三种斗争方式，也展现了作为非政党力量的思想学派对于极右翼政治的

① Tamir Bar-On, *Rethinking the French New Right*, p. 220.

② Tamir Bar-On, *Rethinking the French New Right*, p. 222.

③ Nigel Copsey, “The Radical Right and Fascism,” in Jens Rydgre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Radical Ri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113–116.

④ Tamir Bar-On, “The Radical Right and Nationalism,” in Jens Rydgre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Radical Ri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17–20.

⑤ Jens Rydgren, “Is extreme right-wing populism contagious? Explaining the emergence of a new party famil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44, no. 3, 2005, pp. 413–437.

⑥ Roger Griffin, “Between metapolitics and *apoliteia*: the Nouvelle Droite’s strategy for conserving the fascist vision in the ‘interregnum’,” *Modern & Contemporary France*, vol. 8, no. 1, 2000, pp. 35–53.

重要影响；^① 其三是社会环境。伯努瓦的欧洲主义思想借助独特的话语体系和话语策略打破了右翼政治思考中的政治禁忌，将身份认同、文化、族群等议题引入公共辩论，重塑了政治和思想文化环境，为极右翼的政治崛起创造了新的政治空间。

六 余论：当代视野下的伯努瓦

以反平等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批判、“差异的权利”的主张与重建“欧洲帝国”的理想逻辑连贯地构成了伯努瓦欧洲主义思想的核心部分。自由主义批判构成了欧洲主义思想的背景与前提，是对欧洲危机的诊断；“差异的权利”构成欧洲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核，是对欧洲危机的解决方案；“欧洲帝国”理想构成了欧洲主义思想的实践方案，是对“差异的权利”的逻辑延伸和承载框架。伯努瓦的欧洲主义思想创造了超越法西斯主义和传统民族主义的新的极右翼话语体系，代表了一种新的斗争方式，重塑了政治和思想文化环境，为极右翼政治的复兴奠定了思想基础。

探讨伯努瓦欧洲主义思想的意义并不只限于对极右翼政治的理解。在思想层面上，伯努瓦独特的欧洲主义思想不仅显示了右翼思想的丰富性及其与当代思想（如全球化批判、社群主义）和当代议题（如生态主义、身份政治）相结合的巨大潜能，更反映了当代右翼中重要一支对于平等与差异关系这一政治思想史基本问题^②的独特思考。在现实意义上，在伯努瓦欧洲主义思想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背后，正是欧洲乃至世界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层面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尤其是逐渐涉入国家核心权力和认同政治领域而面临日益重大挑战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对伯努瓦欧洲主义思想的研究为我们管窥全球化与一体化深入发展进程中的欧洲政治与世界政治提供了一个重要且独特的视角。

在当前的极右翼政治浪潮中，更引人瞩目的是在选举和街头抗议中慷慨激昂、拨弄风云的政党和社会运动，而在口号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则较少受人关

^① John Veugelers and Gabriel Menard, “The Non-Party Sector of the Radical Right,” in Jens Rydgre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Radical Ri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288 - 290.

^② 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第28—32页。

注。就恢复和提升右翼思想和右翼政治议题在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这一目标而言，当前欧洲政治的“右转”与极右翼政治的复兴对于伯努瓦来说无疑宣示着“胜利”。但这种“胜利”却是通过伯努瓦并不认同的“恐惧政治”（Politics of Fear）和“怨恨政治”（Politics of Resentment）实现的，因而这并不见得是他真正想要的胜利。